

# 教育资源配置与生育率

陈友华 苗 国

**内容提要** 本文研究了教育资源配置格局对生育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认为:教育资源差别化配置,使得不同教育机构提供的学习环境在教育质量之间的差异趋于扩大,加剧了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正是在这种资源约束条件下,家庭多采取“质量替代数量”策略,以便集中更多资源获得优质教育资源,也就是说教育资源差别化配置影响了妇女的生育意愿,并使之维持在较低水平上。因而从这个角度上看,教育资源差别化配置也具有“计划生育”功效,同时也是影响生育率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 教育资源 资源配置 生育率

陈友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210046

苗 国,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210046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210004

## 一、研究背景

众所周知,“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分别于2013年与2015年颁布实施,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但政策实施效果可以用“叫好不叫座,响应者不多”来概括。为此有学者指出,政策性补偿二孩生育数量远低于预期,中国低生育率格局早已形成,持续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人口新常态<sup>[1]</sup>。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生育(这里指“生”与“育”两者,下同)成本高,对生育行为产生了极大的抑制作用,是主因之一。虽然不同区域、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经济状况不同,子女养育成本及支出结构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育儿成本高涨是不争的事实。有经验研究显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公共政策及其机制研究”(17ZDA120)、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人口转变视角下教育结构失衡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研究”(14CRK017)、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陈卫、张玲玲:《中国近期生育率的再估计》,〔北京〕《人口研究》2015年第2期;王金营:《“全面二孩”下21世纪中国人口仍难回年轻》,〔上海〕《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2期。

示:育儿成本中,教育成本分担正在向个人和家庭倾斜。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China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Finance Research, CIEFR)发布的“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hina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Finance Research—Household Survey, CIEFR—HS)”结果显示,“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总体规模约19042.6亿元,占2016年GDP比重达2.48%”。这一投入无论规模还是增速都非常可观<sup>[1]</sup>。而《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更显示:中国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支出的50%以上<sup>[2]</sup>。据汇丰银行2017年统计,中国大陆家庭平均教育支出以42892美元居于世界第五,有93%的中国父母选择给孩子请私人辅导,列世界首位<sup>[3]</sup>。或许网络调查数据有一定偏差,但结论却引发家长的强烈共鸣,教育支出膨胀特别是支出“隐形化膨胀”是教育成本飙升的主要推手,在争抢优质公立教育资源之外,出国留学、择校、课外辅导、学区房追逐等“市场机制补充”,使得优质教育资源竞争形成“多元化”格局,激烈程度日趋“白热化”,最终表现为:“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的校内教育支出明显高于义务教育阶段,校外教育支出则表现出相反的模式”<sup>[4]</sup>。

“教育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分层机制之一,学校教育也是社会成员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sup>[5]</sup>比如,社会众多优质岗位设置的硬标准多涉及受教育水平,这是社会阶层分化的第一道关口。对于一个崇尚实用主义的国度,高学历与文凭崇拜有其强大的民间基础。也就是说,出国求学的“幼龄化”、择校兴盛、学业负担过重、学区房价格飙升等社会热点问题都只是表象,而真正产生影响的是人口学意义上的“结构性冲击”。按照常理认知,随着人口出生队列的大幅度下降(2018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523万人,而1990年出生人口2400万左右<sup>[6]</sup>),原先“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教育资源争夺战应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现实恰恰与普通公众的直觉相反:一方面,教育资源争抢的冲突不是缓和了,而是进一步激烈化与隐形化;另一方面,调整生育政策,降低抚育成本,从而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的初衷远没有实现。那么,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哪些?教育在其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本文将从一个新的视角,着重讨论教育资源配置格局对生育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 二、中国当前生育与教育发展状况

### 1. 生育率下降与教育成本飙升

众所周知,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高度负相关。中国大中城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文化圈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升学率甚至出现高于男性的趋势<sup>[7]</sup>与生育率急剧下降、低生育率问题的相伴随,

[1]中青在线:“我国家庭教育年总支出超1.9万亿 占2016年GDP比重达2.48%”,[http://news.cyol.com/yuanchuang/2017-12/29/content\\_16824340.htm](http://news.cyol.com/yuanchuang/2017-12/29/content_16824340.htm)。

[2]新浪网:“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http://k.sina.com.cn/article\\_6351043420\\_17a8d3b5c00100287e.html?cre=edupagepc&mod=f&loc=5&r=9&doct=0&rfunc=100](http://k.sina.com.cn/article_6351043420_17a8d3b5c00100287e.html?cre=edupagepc&mod=f&loc=5&r=9&doct=0&rfunc=100)。

[3]新浪网:“全球教育报告:国内平均教育支出42892美元”,[http://edu.sina.com.cn/zl/edu/2017-11-24/doc-ifyp-ceiq0754447.shtml?cre=zl&r=user&pos=5\\_3](http://edu.sina.com.cn/zl/edu/2017-11-24/doc-ifyp-ceiq0754447.shtml?cre=zl&r=user&pos=5_3)。

[4]迟巍、钱晓桦、吴斌珍:《家庭教育支出平等性的实证研究》,〔武汉〕《教育与经济》2011年第4期。

[5]巫锡炜:《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变动趋势:队列视角的考察》,〔北京〕《人口研究》2014年第6期。

[6]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局长就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901/t20190121\\_1645944.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901/t20190121_1645944.html)。

[7]盖文·琼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低生育率:原因和政策回应》;金敏子:《部分东亚社会针对极低生育率的对策响应》,参见王丰、彭哲、顾宝昌编著《全球化与低生育率:中国的选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Yoo, S., “Educational Differentials in Cohort Fertility during the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South Korea”, *Demographic Research*, 2014, 30, pp.1463-1494。

不仅带来人口自身的可持续问题,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大众教育制度本身的反思。

尽管生育率下降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常常出现的是生育质量替代数量策略,这种生育率下降与大众教育普及互为因果<sup>[1]</sup>。或者说“低生育行为”替代“多子女偏好”是一种结构性的转变。有专家认为,在生育行为分析的诸多理论框架中,经济因素与社会结构变迁是两个最重要的分析维度。加里·贝克尔(S. Becker, G)在《生育的经济学分析》中第一次将人类生育行为纳入经济学的理性行为研究框架<sup>[2]</sup>。他从“效用”角度将子女视为一种消费品或者投资品,认为选择子女生育数量是按照理性原则,力图达到最大化父母收益的行为,这其中,生育与否是基础性投资,子女培养则是后续投资。根据此分析框架,人们发现子女的“最优”数量是一个由多个参数所决定的值,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参数分别是母亲的受教育年限与儿童的死亡率。

然而,在今日的中国,特别是在低生育率约束下,教育投入开始出现异化,其主要表现为:养育资源投入演变成为代际、家庭、社会资源的全面比拼,在这场“质量竞争”锦标赛中,一方面是需求端的“无限膨胀”,所有人都对子女教育寄予更高的期望,人们更加注重后续投资(质量追求),而不再关注基础性投资(数量追求);另一方面,教育资源的再分配与国家的干预,往往在计划经济式的“刚性”调控和市场化的“自然调节”两者之间不断摇摆。从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教育资源的供给与需求,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很难调和的,特别是在亚洲儒家社会传统影响下更是如此。

## 2. 教育状况:阶层分化背后的结构性反思

尽管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作为供给端的中国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人们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不满还是与日俱增。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应试教育依然大行其道,“文凭崇拜”与“排位文化”造就的社会“区隔”是其本质,这一“功利主义”模式无论在教育质量还是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效果都不尽如人意;二是民众对子女教育越来越重视,无论社会阶层如何,都想获得优质教育资源,但优质教育资源总是稀缺的,远远满足不了所有人的需要;三是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演变成为对学区房等的追逐和学生课外辅导等,这也大大加重了家庭的教育负担,百姓对教育“市场化”带来的成本飙升怨声载道但又趋之若鹜,以至于教育不平等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热点问题,引起各界的强烈关注,并引发社会舆论批判与学界反思<sup>[3]</sup>。

随着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增长与生育观念的变化,现代化的“城市生育观念”已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广大农村“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也随着社会转型而不断弱化:人口再生产组织的基本单位正在经历一场“现代性革命”,低生育率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子女“质量论”抬头也是一种高生产力与高抚养成本约束下的“个体经济理性”。然而,当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生育文化的组成部分之后,低生育率又会导致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自发形成某种“公用地悲剧”。每个人都幻想通过制度设计来预支未来的福利,这种财富转移跨期支付的关键——人口可持续平衡发展,是制度设计不“透支”的关键。但令人遗憾的是教育资源差别化配置导致并固化了低生育率水平。

[1]Caldwell, J., “Mass Education as a Determinant of the Timing of Fertility Declin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0, 6(2), pp.225-255; Axinn, W., & Barber, J., “Mass Education and Fertility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1,66(4), pp.481-505.

[2]Becker, G. 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in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94-111.

[3]朱永东、叶玉嘉:《我国教育公平研究之十年》,〔北京〕《中国高教研究》2007年第5期;吴晓刚:《1990—2000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学校扩招和教育不平等》,〔上海〕《社会》2009年第5期;李春玲:《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1940—2010)——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考察》,〔北京〕《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2期。

### 三、教育资源差别化配置与低生育率陷阱的形成

教育资源的差别化配置导致各学校提供的教育存在质量差异,必然会带来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人们通过减少生育,集中相对多的精力投入到对教育资源的竞争中。这种教育差别化配置在供给端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需求端高学历与文凭崇拜的需求在不断飙升,从而导致教育的异化与低生育率陷阱的出现。低生育率导致家庭的少子化与小型化,而家庭的少子化又通过社会结构、传统文化等系列中间因素导致低生育率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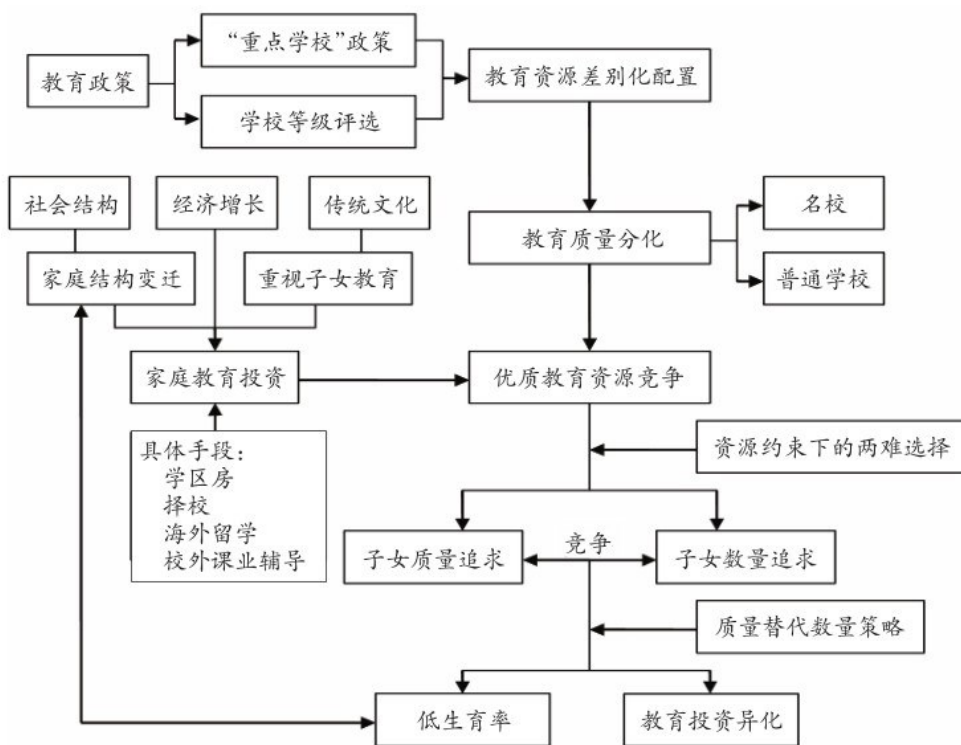


图1 教育资源差别化配置与低生育率形成机制

如图1所示,教育资源差别化配置与低生育率形成机制,是自1954年开始的。1954年,在集中力量办好一批学校的方针指导下,划分出了各类不同等级的重点与一般学校;之后又推出了各种形式的学校等级评定等。在此基础上,政府对教育资源进行差别化配置,及学校自强化机制与马太效应,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严重分化,出现了各种不同等级的名校与普通学校,及质量差异很大的教育。限于资源约束,家庭面临两难抉择:对子女教育质量的追逐还是对生育子女数量的追求。

此外,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又使得社会结构特别是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人们的经济条件普遍改善,开始有能力在子女教育方面进行物质投入;另一方面,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教育资源争夺战的加剧,突出地表现在少子家庭甚至独生子女家庭的大量出现。随着家庭子女数量的急剧减少,家庭子女教育策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以往的“广种薄收”发展到现在的“少种多收”,由过去的“放养”发展到现在的“精养”。总之,通过购买学区房、花钱择校、参加校外课业辅导班等方式,加大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目的是想在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战中更具竞争力。

由于教育资源竞争一般采用排位(晋级)模式,能够晋级的比例总是相对固定的,有些竞争者即便教育投入再多,“掉队”也不可避免。对此,有学者“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儿童样本研究发现尽管当前中国儿童的兄弟姐妹普遍较少,但获得的各项教育资源及其学业成绩依然随兄弟姐妹

的增多而显著降低。不仅如此,儿童的教育资源获得还可以有效解释兄弟姐妹数对学业成绩的消极作用;并且,各类教育资源的解释力在不同学科上也存在差异”<sup>[1]</sup>。也就是说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多数家长可能会更认同资源稀释论,子女数量的稀少决定了“只能成功,不能言败”,这更让中国家庭采取“质量竞赛”而缩减子女生育数量,固化低生育率行为。

尽管,关心下一代的教育成长是一种人类文明的独特现象,但在今日中国,教育投入“军备竞赛化”与教育管控“精细化”,蒙蔽了人们的双眼,过分关心后续投资(质量追求)而不注重基础投资(数量追求),是现代人有“孩奴感”的重要推手,并形成了“某种恶性循环”。一方面是因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让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妇女角色多元化,很难同时兼顾好工作和家庭,另一方面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模式要面临的“物质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之间的根本矛盾。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是由欠发达国家走向发达国家的榜样,有人预言人口政策面临的矛盾未来在中国上演的概率很大,东亚超低生育率的前车之鉴更令人警醒:东亚社会采取的刺激型生育政策的作用相比西方更为有限,其根源就在于东方与西方教育与职业发展的体制与文化差异。

## 四、结果与讨论

### 1. 结论

本文研究了教育资源配置格局对生育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认为:教育资源差别化配置,使得不同教育机构提供的学习环境在教育质量之间的差异趋于扩大;生育率走低,家庭子女成才预期提高,加剧了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低生育水平与教育资源配置的分化“相互促进”、恶性循环,固化了低生育行为。一方面,中国优质教育资源的差别化配置,不同等级学校提供的学习环境在教育质量差别很大,不同社会阶层家庭依托“市场化”渠道展开了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子女教育成本上升,并由个人与家庭承担。另一方面,优质教育资源总是稀缺的。每个家庭都希望孩子能接受最优质教育,国内外经验研究显示,由于公立教育资源所声称的“均等化”配置,很难从根本上缓解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因此在资源约束条件下人们只能采取“以质量替代数量”的竞争策略,避免资源稀释,从而促使妇女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形成某种“计划生育”效果。

### 2. 讨论

(1)基础教育发展目标究竟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中国教育的培养目标究竟是精英还是普通劳动者?事实上,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以及社会分层的主要维度,“文凭”教育本身是一种特权(privilege)而不是一种赋权(entitlement),特别是具有品牌意义的优质教育资源:“名校可以开一定数量的分校,开放网络教学,共享优质教育信息,但不能人人都是名校生,获得名校头衔”。我们认为,文凭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区隔(distinction)与身份标签(label),优质教育的排位战即社会“身份制”的延伸,追求文凭认证的东亚教育模式是具有一定反市场化倾向的,否则,“人人都上名校意味着没有任何社会区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乃至东亚社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差异化配置模式,其“具体体现在对大学入学考试和科举制度的混淆;对复习的过度重视;平均主义和匮乏心态的影响;工业化追赶带来的浮躁心态等几个方面”<sup>[2]</sup>。其实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很显然,中国的教育模式改革未能顺应这种时代要求,中国的家长也在这种社会

[1]张月云、谢宇:《低生育率背景下儿童的兄弟姐妹数、教育资源获得与学业成绩》,〔北京〕《人口研究》2015年第4期。

[2]澎湃新闻:“诺贝尔奖得主:东亚教育浪费了太多生命”,[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62055](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62055)。

结构模式制约下走向教育“军备竞赛”。

(2)衡量基础教育成败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尽管教育部门在不断尝试弱化基础教育“显性”的淘汰机制——不可按成绩分班,甚至不允许公布学业成绩,但教育比拼的结果依然是最重要的指挥棒,衡量小学与初中办学成败的主要指标演变成有多少学生考取了当地最知名高中,衡量一所高中教育好坏的标志变成了有几个能上北大清华。中国现在的基础教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锦标赛教育”:将优质资源集中于少数尖子生,希望这些尖子生为学校出成绩;而对于一般的学生,多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这完全偏离了基础教育的宗旨。这种不正常的教育资源配置模式,让优质生源集中在几所师资与硬件均为高端配置的学校,导致教育格局呈严重的“不均衡”甚至“极化”分布,不仅破坏了教育生态,更带来了学校间的无序竞争。

面对这种竞争,一味推行公立教育“减负”是难以持久的。以日本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希望以“宽松教育”终结“考试战争”“四当五落”,更希望通过“宽松教育”提高下一代的综合素质。但这些措施带来的实际效果却是“南辕北辙”。很多家长担心这样的培养会让孩子无法在升学竞争中胜出,为了保证子女的考试竞争力,家长们纷纷选择增加课外学习时间。也就是说,即便公共教育资源能实现教育资源的均等化配置,学校提供大致相近质量的教育,但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与教育体制的约束下,父母让子女接受更优质教育的动力并不一定下降。尽管统计规律告诉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会很平庸”,但在“低生育水平”条件下,家庭总会想着把每一个孩子培养成为卓越者。不切实际的激励,导致不切实际的幻想与后果,甚至影响了家庭对于生育子女数量的理性判断。我们认为,只有让教育资源配置回归“正态分布”“均等化”教育公共政策才会减轻某些家庭用于子女教育的经济负担。也就是说,公共教育政策的优化,可能会促使部分夫妇降低“成才焦虑”,促使生育率的回升。

(3)生育的后续投资与生育的基础投资究竟哪个更重要?在子女数量与质量的替代选择中,人们多是“理性地”选择“质量替代数量”的“望子成龙”培养模式,却很少会有人尝试“数量堆积,等待质量”的“守株待兔”模式。对于家庭、组织还有社会,人力资源与人口资源究竟哪个更重要?实际上,人力资源是建立在人口资源基础之上的。而成才是有一个大致的比例的,人人成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人口与人才之间存在着某种类似确定性的关系,人才总量多取决于人口总量。换言之,生育如果被视为家庭、组织还有社会面对未来的投资行为,则生育数量就是对人类未来的基础性投资,人口多意味着希望大。尽管当今依然有马尔萨斯主义者担心人口无限制膨胀,世界上的资源迟早会耗尽,人类社会无法持续,但我们反向思考一下,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是因为外部的资源越来越丰富了吗?不是。地球依然还是那个地球,资源还是那些资源,因为几乎所有的财富都是由人创造的,是由人的心智、想象力所创造的。只要人类有更多的子孙,人类的想象力就没有止境,财富的创造也就没有止境。总之,教育只是对人类未来的后期追加投资,追加投资是建立在基础性投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基础性投资,生育水平无法维持“更替水平”,那么上述的低生育率社会,一定会走向衰亡,再多的后期追加投资又有何用呢?

[责任编辑:方心清]